

浅论孟子对唐甄的影响

◎石林子

摘要：孟子的言论著作收录于《孟子》一书，对后世的儒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潜书》是唐甄遗世的唯一著作，集中反映了他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书中的《辨儒》《尊孟》《宗孟》等篇章，表达了唐甄对孟子的推崇，凸显了孟子对唐甄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孟子 唐甄 心性说 民本思想

《孟子》是记录孟子言行的一部著作，也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孟子是在被诸侯君王们认为“迂远而阔于事情”的窘境中走上了立言之路。正是立言，使孟子成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他以继承孔子衣钵为己任，为儒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使儒家思想成为影响中国两千余年的正统思想。

唐甄生于明清鼎革崩解之际，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一生仕途十分不顺，生活困苦，但著述不辍，费时三十年而成就一部《潜书》。他非常推崇孟子，在《潜书》中专设《辨儒》《尊孟》《宗孟》等篇论孟子之学，他表示“闻孟子之言，而后知圣人之治天下”“甄虽不敏，愿学孟子焉”。

一、心性说

孟子是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与孔子并称“孔孟”，他的思想博大精深，包括政治、哲学、教育、文艺等诸多方面，心性说作为其哲学思想的重要方面，深刻影响了之后的程朱理学、阳明心学等思想流派。唐甄对孟子心性说不是抄袭，不是搬用，而是加以改造，为我所用。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评论说：“铸万虽极力提倡心学，然与宋明儒明心见性不同，他养心专为治事用，所以心学只是手段，不算目的。”

孟子是先秦诸子中较早对人性进行系统探讨的思想家，他对人性问题进行了多方阐释，提出了人性本善的理论，性善论是其心性说的核心内容。孟子认为人皆有“四心”，《孟子·告子上》记载：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

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孟子认为人人都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而且这四心并不是外界所赋予的，是人“心”本来就具有的。在“四心”基础上，他进一步论述了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等“四端”。在他看来，人的善性与生俱来，此“四端”就如人有四肢，是先天而来，他虽然认为人性本善，却没有否定后天的作用和修身的重要性。此四者必须经过自我修养，扩大而充实它们，才能发展成为“仁、义、礼、智”等现实的道德行为，进而足以安定天下。

唐甄深受孔孟传统儒家思想影响，非常重视内在的心性修养，在孟子“心性说”的基础上，对“心性”有了新的见解。他先用孟子的话定义“性非他，仁义礼智是也”，进而定义什么是“心”，“仁义礼智非他，人心是也”。“心”与“性”虽称谓不同，其实皆是“仁义礼智”也，说明“心性”的一体性。在《潜书·宗孟》中，他认为“良知，在我者也，非若外物，求之不可得也”，也就是说“求心”的方法是“良知”，而求“良知”的方法是靠“自得”。

唐甄“尊孟”“宗孟”不是抄袭孟子，而是把孟子的学说建构成有内在逻辑体系。他并没有像一些心学家那样走上空谈心性之路，而是主张既要“自修”心性，又要扩充出去，“达则兼济天下”。他认为修德的过程，必须施之于“政事”，才是一个完整的修德过程，所以，在《潜书·辨儒》中，他认为“心体性德，既已自修，天地万物，何以并治？必措之政事而后达。”“仁义礼智俱为实功”，“实功”者何？他认为“阴阳顺逆，人气所感，

百姓既安，沴戾消释，则地无山崩水溢之变，天无恒暘恒雨之灾，万物繁育，咸得其生”“是故虚受不可言仁，必道能广济，而后仁全于心，达于天下”是也。《潜书·性功》记载：

修身治天下为一带，取修身，割治天下，不成治天下，亦不成修身；致中和育万物为一带，取致中和，割育万物，不成育万物，亦不成致中和；克己天下归仁为一带，取克己，割天下归仁，不成天下归仁，亦不成克己；孝悌忠信制挺挞秦楚为一带，取孝悌忠信，割制挺挞秦楚，不成制挺挞秦楚，亦不成孝悌忠信。若续所割二尺五寸之带还为五尺之带，可围可结可缀，两端之褻然，而中有续脊，终不成带。

唐甄把“尽性”和“事功”的统一比作朝服上的丝带，此带本来长五尺，如果把它割裁成二尺五寸，想通过围、结、缀等方式还原，就不能作为丝带了，“尽性”和“事功”的关系就像朝服上的丝带是不能分割的。他认为，“心性”和“事功”本来就是一个完备统一的，这是他对孟子“心性说”的继承和发展。

二、民本思想

孟子一生向往为官从政，希望一展抱负、治国平天下，给百姓带来福祉。战国二百余年间，发生了大小战争二百余次，他游历各国，亲眼所见老百姓所遭受的由暴政、战乱带来的疾苦，孟子不忍见民众无辜死于刀兵之祸，《孟子·梁惠王上》记载：

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孰能与之？’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

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其如是，熟能御之？今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孟子所处的时代，社会正处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阶级矛盾十分尖锐，他能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强调对平民百姓的尊重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不得不让人感佩，民本思想也是孟子政治思想中最辉煌的部分。

孟子深刻而系统地阐述了民本思想，并把它发展成为仁政的理论基础，运用到施政纲领之中，在《孟子·尽心下》中，他认为：“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赵岐注云：“诸侯正其封疆，不侵邻国，邻国不犯，宝土地也。使民以时，民不散，宝人民也。修其德教，布其惠政，宝政事也。”在孟子看来，土地、人民、政事是国家的三个基本要素，土地为立国之基业，人民为守国之根本，政事为经国之纲要。在此基础上，孟子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这段话肯定了百姓在国家中的基础地位，认为百姓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比君王重要得多；只有得到百姓和赢得民心，才能得到天下和成为天子。

“民贵君轻”一经提出，对传统社会产生了极大震动，以致绵绵不绝影响了两千多年，成为各代思想家批判君王专制的锐利武器。此外，孟子还提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此言被后人简洁概括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流传度极高。更为可贵的是，孟子还提出了可以变更君王的主张：“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如果诸侯危害了国家社稷，则可以改立诸侯。

自秦汉以后，民众在政治上的作用与地位逐渐被有识之士所认识到。历史上不少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都对孟子的“民为贵”思想有所继承与发挥。如唐太宗称：“国以民为本”，南宋思想家陆九渊认为

孟子的民贵君轻论是“大义正理也”“知人主之职分”。在明末这一思想解放的时期，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唐甄等一批进步思想家也都对孟子的“民为贵”思想有所借鉴发挥，并且提出许多大胆的民本思想，对专制皇权制度进行反思，这其中孟子思想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战国以来，虽然对君主专制政治持批判态度的思想家代不乏人，但在儒家学派内部，人们更多指斥的是王朝末世的暴君庸主，至于秦汉以来的君主专制政治，却很少在整体上提出批评意见。唐甄则明言“帝王皆贼”，《潜书·室语》记载：

唐子曰：“大清有天下，仁矣。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妻笑曰：“何以谓之贼也？”曰：“今也有负数匹布或担数斗粟而行于涂者，或杀之而有其布粟，是贼乎，非贼乎？”曰：“是贼矣。”

这是唐甄猛烈抨击封建帝王的一篇文章，他纵观历史，认定“自秦以来，凡帝王者皆贼也”。一定程度上来说，他对于秦汉以来君主专制政治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以往的思想家。他敏锐地认识到，秦汉以降治世少乱世多，主要原因就在于君主对权利的高度垄断。由于权利集中于君主一人之手，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对其形成制约，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儒君蓄乱，辟君生乱，暗君召乱，暴君激乱”的恶果。


唐甄极大地发扬了孟子的民本思想，唐甄认为，国家的封疆，府库，朝廷，官职都是“民”固之，充之，尊之，养之才有了今天的成果，所以民应该是“上者”，然而当下社会“攘民”，“忘民”的官员遍及全国，致使民不聊生，国家穷困，所以唐甄针对这些问题主要提出了要“养民”“富民”的思想，通过“养民之善政”实现“达政”的目标。孟子认为：“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施仁政于民，让人民有“恒产”，“省刑罚，薄税敛”都是孟子具体提出的养民爱民的措施。唐甄依据这些思想提出了“达政”，“省官”，“富民”，“考功”等措施，与孟子的思想非常接近，可以说他不仅学习发扬了孟子的思想，而且将很多思想具体化可操作化，让这些措施确实有可视性

的可能与途径。

三、结语

大多数学者都肯定了唐甄与孟子的承继关系，如《潜书》的张序认为唐君之书“皆孟子之学”，潘序认为唐甄“尊孟宗王”，而近人萧公权也认为唐氏谈学论政“远承孟子”。唐甄的思想是在继承孟子哲思的基础上，结合时代背景与个人体悟，得出的新的发展。

唐甄与遂宁吕潜、新都费密，合称“清初蜀中三杰”，与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并称明末清初“四大著名启蒙思想家”，被中宣部、国家教委列为对中国历史有重大影响的“杰出思想家”。唐甄思想在我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梁启超曾将唐甄的《潜书》评价为中国历代圣人思想的一个总结，认为它凝聚着“东方哲人智慧的精华，实在是醒人之良药，逆耳之忠言”。魏禧评价唐甄的《潜书》为“五百年无此文矣！”。他提出的“批判帝制，主张均等”的民本思想、“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的儒家思想、“革新政治、整顿吏治”的政治思想、“兴军强国”的军事思想、“鼓励农桑、富民兴邦”的经济思想、人人接受平等教育的“平民教育”等等论述，至今仍熠熠生辉。

唐甄作为土生土长的达州人，是当地巴文化的典型人物，2019年入选为“巴文化·达州十大历史名人”。有学者认为，“唐甄思想是巴文化研究的重要一页”“唐甄思想研究是巴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认为，进一步探讨孟子对唐甄的影响，探寻唐甄思想的渊源，研究唐甄对孟子以及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化，有助于今人更加深入地了解唐甄其人其书，更加形象地了解达州巴文化。

基金项目：本文为四川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2020年度立项项目，达州市巴文化研究院和四川文理学院巴文化研究院资助项目《孟子对唐甄的影响》（编号：SLQ2020BB-023）成果。

作者单位：达州市巴文化研究院